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討論文集

中国现代史第二次
学术与教学讨论会

1981·大连



编 辑 说 明

一九八一年八月一日至九日，中国现代史学会于大连召开了《第二次学术与教学讨论会》，共收到学术论文一百三十余篇。学会秘书处决定编辑出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讨论集》，责成东北师大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选编，并由辽宁师范学院科研处负责印刷、发行。

论文中属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约六十余篇，此次共选入十三篇。这些文章有的是论述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步思想的；有的是关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领导权问题的；有的是论述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有关问题；有的是论述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的，还有关于帝国主义、军阀活动等。本着百家争鸣，不断探索的精神，我们对不同观点的文章，一并选入，以便进一步研究和讨论。由于篇幅所限，许多文章，未能选入，敬请鉴谅。

参加本书编选工作的有王维礼、石雅贞、肖孟然、周玉和、徐桂荣等同志。我们水平所限，缺点和错误，请批评指正。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目 录

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初步思想……………王金铎 (1)

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领导权问题

——学习《周恩来选集》(上)的一点体会

……………王刚峰 (24)

试论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时的领导权问题……………洪京陵 (39)

试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杨振亚 (57)

论武汉政府的性质及其历史经验……………曾宪林 (77)

武汉政府时期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

……………袁继成 刘继增 毛 磊 (97)

述评武汉时期的汪精卫……………吴德华 (128)

戴季陶主义浅论……………周玉和 (154)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问题… 顾 群 (175)

北伐战争中的江西战场……………周奎书 廖信春 (191)

北伐军在河南的速胜和撤军

……………蒋相炎 郭传奎 傅振纲 (215)

冯玉祥和国民军……………高德福 杨 珣 张洪祥 (234)

滇桂军阀杨、刘在广东……………周孝中 (258)

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的关税会议… 李光一 (275)

附 录:

中国现代史学会第二次学术和教学讨论会关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若干重大问题讨论概况

封面设计: 李 睿

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步思想

吉林大学历史系 王金铨

关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形成，从五十年代起，一种普遍的说法是：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已经“看出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看出了中国政治斗争的发展规律”，“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思想和根本路线”。我认为，为了更好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应该开展党的思想发展史的研究，其中包括对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从产生、形成到完备的过程，进行切实地历史的分析，从而得出科学的论断。本文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步思想，做一些探讨。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般地规定了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当时还谈不上有实际的战略策略思想。一年以后，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对中国复杂的历史情况社会情况和中国革命，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二大认定，中国社会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统治下的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明确提出当前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动力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工农携手”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证。二大还设想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图画。

一九二二年八月的中央特别会议和一九二三年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又确立和通过了与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二大、三大的如上一些观点，是过去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来未曾被人正确提出过的新的革命思想。

二大、三大对于哪个阶级应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这个区别新旧民主革命最重要的问题，没有正确的认识。二大认为资产阶级已能“结合全国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和北京政府”，无产阶级要等革命“发展无已”，才能成为革命的“领袖军”，现时不过是“援助民主革命”的助手。^①三大指出中国工人运动尚未强大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希望国民党“树立国民革命之真正领袖地位”。^②

党的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等，在二大、三大期间和以后，写了许多文章，对党的代表大会思想做了发挥和补充。陈独秀在《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和社会各阶级》和《中国农民问题》等文章中，指出：中国革命“毫无疑义”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但不同于过去西欧“宗法封建社会崩坏时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这种革命的特点是：第一、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个敌人，有

①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②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个意义”。第二、中国工业不发达，资产阶级不能“独立”“形成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①“没有最革命的劳动阶级奋斗”，“中国资产阶级解放运动不能成功”。^②第三、中国革命是“世界的革命之一部分”，“重大的一部分”，因为它反帝，势必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同盟军。陈独秀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革命的”（新兴工商业者）、“非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官僚资本阶级）三部分。指出官僚资本阶级“始终要靠帝国主义的列强及国内的军阀而生存”，“是阻挠革命运动”的反革命，民族资产阶级“因为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妨碍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而赞成革命”。认为半殖民地中国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去资产阶级的援助，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③，“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观念”^④。陈独秀分析中国农村各阶级（大中小地主、自耕农、佃农、雇农）的经济地位和“中国农民之痛苦”，指出：在经济落后的殖民地，农民是全人口之大多数，国民经济之真正基础是农业；“在这些地方之各种革命都不可忽视了农民的力量”^⑤。“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他认为散漫保守等许多弱点，使农民“难以加入革命”但国内外的环境“有驱农民加入革命的可能”^⑥。

① 《中国国民革命和社会各阶级》《前锋》第1期

② 《国民党与劳动运动》《响导》第71期

③ 《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响导》第22期

④ ⑥ 《中国国民革命和社会各阶级》

⑤ 《中国农民问题》《前锋》创刊号

应该说陈独秀是较早地注意了农民，但是总的说来，他基本上是把农民做为广大落后的潜势力，而并未做为无产阶级现实的革命同盟军看待。陈独秀对工人阶级的估计是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很幼稚，“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真正有阶级觉悟的是“少数中的极少数”，因此在国民革命中“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①陈独秀提出“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其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②。而“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③陈独秀阐述了若干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观点，但是他的思想并未脱离旧民主主义的窠臼。

一九二三年七月，瞿秋白发表《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分析帝国主义侵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崩溃和中国资本主义从官僚买办资本、商业资本、手工工场到近代工业的“特异”发展过程。指出在帝国主义的控制下，“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决无独立之可能，更决无充分之可能”，这个阶级“很觉着外货的侵占”，“有抵制帝国主义的必要”，但他们“组织生产的能力”，“非常之小”，“阶级发展的程度”，“不足管理国家”，因而不能独立地“发生什么民主共和的运动”。中国无产阶级，尤其是铁路工人、矿山工人、纺织工人、海员等，“直接与官僚军阀冲突，感觉帝国主义压迫最甚，”已经“直接行向民族斗争政治斗争。”无产阶级固然“因中国资产发展的种种特性而尚弱，然而资产

① ③ 《中国国民革命和社会各阶级》《前锋》第1期

② 《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2期

阶级之弱更甚于劳动阶级”，因此中国的民族运动，“得最宜于组织最易有团结的无产阶级之猛进，”“联合小资产阶级”，“督促资产阶级而行向民族革命”^①。瞿秋白把无产阶级看做革命的先锋，把资产阶级看做被督促的对象，与陈独秀的观点有很大不同，比党的二大、三大的认识也前进了。在《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中，他更进一步地指出：劳动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将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②。瞿秋白这类认识，可以说是我党关于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的最初萌芽。

国共合作以后，党利用当时的有利形势，恢复工人运动。到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工人运动有了显著的发展，使人们对“五四”以来工人阶级一再表现出来的伟大战斗力和革命精神，有了新的认识。与此同时，国民党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对军阀的妥协，对右派的姑息，对工农运动的责难，使人们对它能否领导国民革命，产生了怀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邓中夏在《中国工人》第二期发表《我们的力量》一文，用大量的经过调查的事实，对陈独秀的工人阶级“幼稚”论，提出有力的批评，在我党的历史上，最早明确地肯定无产阶级应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邓中夏指出中国产业无产阶级已有二百多万，铁路、海员、矿山工人已经组织起来，并开展了许多斗争。由于中国无产阶级是在本国和外国两种企业中“发育孳长”，它的阶级力量比资产阶级要强。被压迫被掠夺的地位，又使“它的觉悟程度必然要随着反抗斗争的发展而发展。中国资产阶级既使革命也是少数中的极少

① 《中国之资产阶级的的发展》《前锋》创刊号

② 《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新青年》季刊第2期

数”，并且“不能贯彻到底”。小资产阶级有革命要求，但势力不能集中，只能是“革命的助手”。“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的集中的部队，有革命到底的精神”，“配作国民革命的领袖”，成就“目前国民革命以及将来社会革命的两种伟大事业”^①。从苏联刚归国的彭述之，也提到“谁来领导国民革命”的问题，指出：工人阶级“最富有革命性，特别有指导革命的资格”，是“国民革命之真正领导者”。“中国的国民革命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起来作领导才能作到底，才能根本消灭帝国主义与军阀”^②。并错误地估计：“中国的各种社会阶级在国民革命的意义上，现实是能够接受工人阶级之领导的”^③。陈独秀也似有察觉，在一篇文章中，把无产阶级从助手地位升为“督战者”。

经过三年多的革命实践，一九二五年一月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有可能对中国革命做进一步全面的研究。四大明确提出和肯定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在客观上的力量虽还幼稚，而他们革命的要求和决战的心理，在最近的中国民族运动中，已经站在最前进的地位。”“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几年来党日渐与实际政治生活接近”。已经“有可以领导中国国民运动之趋势。”“新兴的工业（纺织业、面粉业、火柴业等）资产阶级”，虽受外资压迫，有“民族竞争的必要”，但因尚处于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到民族工业资产阶级的

① 《我们的力量》《中国工人》第2期

② 《目前政局与工人运动》《响导》第94期

③ 《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新青年》第4期

过渡中，“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因而自然不具有领导中国革命资格。四大明确肯定农民“天然地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农民问题在中国”，“特别的重要”，“党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励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和政治的斗争”，否则，“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四大对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认识，在大会制定的各方面决议中，得到体现。四大对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也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指出：中国革命在“历史上说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德莫克拉西革命”，因反对帝国主义，“与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运动相联系”，“在政治上含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种子”。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要看无产阶级的革命准备程度，以及客观条件如何而定。四大在党的思想发展史上，是一次认识上的飞跃，表明党已经具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步思想。但是，四大对于无产阶级领导地位问题，只是在认识上明确起来了，怎样才能真正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还没有完整的理论和有力的措施。特别是对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性，以及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最重要的农民土地问题，尚缺乏认识。加上国民党不可能承认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以及它对工农运动的压制，这样，四大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和农民同盟军问题，从认识到实践，还有很大的距离。

“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民族解放运动，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运动中资产阶级的动摇不定，小资产阶级的犹豫怯懦，进一步证明只有工人阶级才是民族民主革命的骨干和领导阶级。运动

也表明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政党，完全能够把工人阶级以外的广大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程度上，把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组织到民族解放运动阵线中来。“五卅”以后，党的许多领导人，认识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蔡和森在一九二五年四月，就论述过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的倾向不同，当民族革命的趋势超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时，资产阶级必然要反革命。只有工农是民族革命的台柱子，工农独立地组织起来，才能增强反帝势力，领导中国民族真正解放。一九二五年五月邓中夏在实际上提出了无产阶级必须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思想。他的《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把无产阶级领导权和政权同革命成败的关系，紧密地联系起来，指出：为了防范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对敌人“妥协软化”，“制止其在革命后之政权独揽”，以及“为将来建设‘工人政府’或‘无产阶级专政’予为准备，”“无产阶级必须不断地增强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从实际政治斗争中去一点一滴的以至于全部的取得”政权。他说“我们对于国民革命，即为了取得政权而参加的”，“政权不是从天外飞到我们工人手中的”，要我们去努力争取，“政权我们不取，资产阶级会去取的”^①。一九二五年八月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发出号召《全国被压迫阶级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下联合起来啊！》表明已经开始公开地与资产阶级争夺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了^②。

一九二五年七、八月出现的戴季陶主义运动，是资产阶

① 《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工人》第5期

② 《响导》第126期

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而实际上是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两条革命发展道路的尖锐斗争。国民党右派发动这场斗争，是要限制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把革命引上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轨道。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根据他们当时对新式的民主革命的理解，参加了反戴季陶主义的斗争。陈独秀指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决不会有欧洲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实现出来”^①，“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是全世界反动之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所应有的革命要求，很容易被他阶级的反动性消灭下去”^②，国民革命的成功，“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展与集中成正比例”^③。瞿秋白发表文章说：资产阶级站在所谓“爱国”立场上的“不偏左也不偏右”的民族运动，一定要被反革命的买办阶级所利用，只有无产阶级斗争的发展，才是“求民族解放的唯一道路，和以后国民革命的进展与胜利的唯一保证”^④。

一九二六年一月毛泽东发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着重论述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以前同以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差异。指出：十八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中期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与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是“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对象是国内的封建贵族，其目的是建设“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其终极是发展“国际资本主义”。后者是几个阶级“合作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官僚军阀买办

①③ 《给戴季陶的一封信》《响导》第129期

② 《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响导》第136期

④ 《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响导》第129期

地主阶级的国民革命”，其目的是建设“各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其终极是要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实现“人类平等世界大同”^①。中国正在进行的革命，属于后者。二月又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对革命具有矛盾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当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猛烈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的阶级发展感到威胁时”，“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在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与反革命作最后斗争的局面下，这一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独立’的余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②。恽代英和他主办的《中国青年》，也发了许多文章，揭露戴季陶主义是资产阶级的骗局，是实行愚民政策，靠少数的资产阶级来包办革命。与此同时，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党和国民党左派，通过决议，继续坚持孙中山的遗嘱和三大政策，斥责和打击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气焰。反戴季陶主义斗争和党在国民党二大的工作，起了维护和坚持新民主主义革命方向的作用。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逐渐增长。一九二六年二月，党的北京特别会议，进一步明确“本

①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之影响》《政治周报》第4期

② 《毛泽东选集》（第4—5页）

党最主要的职任，在扩大农民运动的基础”。指出：“中国革命工人固然站着领导地位，然非更取得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参加，不会成功”。“如果我们的党不能对于自己和自己的阶级，正确地指出农民问题的意义，那这是我们的党不能尽自己的天职——没有做工人阶级的有觉悟的先锋队的领导者的能力”。规定在北伐过程中，党的工作“以解决农民问题为主干”，“发动两湖、河南、直隶等北伐沿途各省的农民运动”，“建筑工农革命联合基地”^①。以达到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与北京会议召开的同时，李大钊发表《土地与农民》一文，论述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以大量的统计材料为根据，分析中国农村的各阶层，提出“耕地农有”是“广众的贫农所急切要求的口号”^②。

四大以后，特别是“五卅”以后，总的看来，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已经转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轨道上来了。

二

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二七年初。在北伐胜利进军过程中，农民运动如暴风骤雨般地发展起来，震撼着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反动统治的根基，上海工人三次起义，武装夺取了政权。蒋介石的反革命势力，也膨胀起来了，他迅速地扩大了由自己控制的反动军队，取得了江浙财阀和日、美帝国主义的支持，迫不及待地要用反革命的政变结束革命。在革命发展的这样重要关头，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共产党，特别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4）（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编）

② 《李大钊选集》（第532页）

需要有更明确完整的理论，回答中国革命的道路究竟应该是怎样的，中国革命应该由谁来领导，谁是主要同盟军，采取什么主要斗争形式，向哪里发展。然而在当时，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要回答这些问题，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显得太不足了。在此期间，陈独秀形成了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马克思主义者同右倾机会主义者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革命方向的重要争论。

一九二六年九月，党的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表明陈独秀已经在思想上政治上严重右倾。会议的政治报告过高地估计资产阶级，说：“‘五卅’以来，中国资产阶级在争取关税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中，渐渐成了民族运动中的重要成分，且有领导此运动之倾向”，北伐过程中蒋介石收编军阀队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武装之形成”，“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的有力参加，必然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无视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现实性。报告还错误地认为共产党“独自领导无产阶级，使其它被压迫民众跟着走，来完成民主革命”的观点“是完全不对的，完全看错了中国民族解放革命的远景”。会议的《农民运动议决案》，要“全体农民联合起来”（包括中小地主）反对土豪劣绅，没有去引导农民解决最迫切的土地问题。规定农民协会“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农民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以免各方面的“冲突”。三中扩大执委会在北伐胜利进军中召开，做出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军事运动议决案》，但只一般地说了“参加武装斗争”，

“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事势力”^①等空话，对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和掌握整个武装力量领导权问题，竟完全没有认识。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党中央的特别会议上，陈独秀形成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做政治报告，指责党的路线过左，造成国共两党关系的危机，完全否认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反革命的事实。在最重要的农民土地问题上，他屈服于资产阶级的压力，说土地问题只可以在宣传上，由减租减息反对苛捐杂税引申过去，不能把它当作斗争口号，陈独秀否认土地革命，压制农民运动，要纠正工农运动“过火”就彻底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和新民主主义方向。特别会议接受了陈独秀的报告，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当时的党中央宣传部长彭述之，假左真右，是陈独秀的追随者。一九二七年一月，他发表文章说：“中国的‘国情’，简直是俄国第二”，中国革命应该是“永续革命”，“从国民革命作到无产阶级革命”^②。一九二七年五月题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讲演，集中了彭述之对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他否认中国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说民族工商业数量太小，在经济上还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势力。他夸大农民的革命性，说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是绝对的”，农民革命势力是“中国革命中无价之宝”，中国农民天生“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是亲近无产阶级的”，有“一种离开资本主义而行向社会主义的倾向”。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在“客观上”“很容易落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4）（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编）

② 《列宁主义是否不适合于中国所谓国情》，《响导》第184期

在”无产阶级手中。关于中国革命性质，他认为中国革命在历史发展阶段上虽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在“客观上不能不带着些社会主义的色彩”。彭述之鼓吹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是天然的和垂手可得的，实际上是取消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和新旧民主主义两种革命的严重斗争。他的“永续革命”，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在中国党内最早的思想萌芽。正是因此，在大革命失败后，他能成为托陈取消派的重要成员。

中国共产党内，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同志，在这个革命的重要关头，开始没有能够立刻拿出他们的成熟意见。他们需要时间，以形成和发展自己的思想。经过暂短的观察与思考，他们的正确思想，迅速地向前发展了，于是党内呈现了思想上和政治上明显的左右分野。

毛泽东长期从事农民运动，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深刻的了解。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他在当时最重要的农民问题上，采取了与陈独秀完全相反的立场。早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就对农民各阶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一九二六年九月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明确指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参加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党“应有大批的同志，下最大的决心，用最大的力量，去做庞大的组织农民的工作”，发动农民“参加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国民革命”^①。为了支持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毛泽东到湖南五个县做了三十二天的调查，于一九二七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4）（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编）